

文史知識

消失中的北京胡同

方謙光

北京的胡同有多少？據老北京人說：「有名兒的胡同三千六，沒名兒的胡同賽牛毛」。據有關史料記載，元代建都時對街道的寬度都有嚴格的規定，寬二十四步的為大街，寬十二步的為小街，寬六步的為胡同。胡同也就是北京最窄的街道。

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道路要不斷地拓寬，隨著舊城的改造，低矮的小平房和「四合院」逐步地被新建的居民社區和不斷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所代替，北京的小胡同也正在不斷地消失和減少。城市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北京要建成一個和世界接軌的國際化大都市，小胡同兒逐漸的自然消失是不可抗拒的事。小胡同伴隨著北京城的誕生而存在，至今至少有八百年的歷史，胡同伴隨著歷朝歷代的榮辱興衰，胡同也就是北京歷史的見證。在胡同裏保留了北京的悠久文化和獨特風韻，也包含著生活在胡同裏的人們的歡樂與苦辣辛酸。

自元、明、清三個朝代在北京建都後，北京一直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在北京城裏居住的，除皇帝老子以外，主要的就是王公貴族，達官顯貴，其次就是保衛--就是京師的御林軍和衛戍部隊，剩下就是為這些人提供各種服務行業。所以長期以來，北京就是一典型的消費城市。

我小的時候，大約是六十年前，那時北京的人口不足百萬，那時滿清政府已經垮臺，國民政府也已經南遷，人去樓空，北京日漸衰敗。那裏的北京沒有什麼像樣兒的工業和企業，除在石景山有座發電能力不足十萬千瓦的火力發電廠之外，還有個煉鐵廠，剩下的也就是門頭溝煤礦。城裏面大部分是一些手工作坊，最著名的也就是「同仁堂」國醫藥、「六必居」醬園子、「王致和」醬豆腐、「王麻子」剪刀鋪，大部分是前店後廠。主要的商業區除了前門外大柵欄一帶，也就是東單、西四、鼓樓前。但北京畢竟是個有著傳統文化的地方，著名的高等學府除有燕京、清華、北大，還有輔仁和北師大。另外還有一些中小學校。在當時的居民結構當中，除政府和公教人員之外，最受人們羨慕的職業是銀行、郵電和鐵路，當時人們

稱銀行是「金飯碗」、郵電是「銀飯碗」、鐵路是「鐵飯碗」。據說當時鐵路員工的待遇最好，除按月能領到薪水，年底還能給各家二袋白麵和一噸煤。不過那時鐵路都是老子退休兒子頂替，鐵路也是世家傳襲，外人很難擠進去。

從當時北京居民的人員結構上分析，當時北京人的就業機會很少，求職並非容易。人們爲了生存，爲了養家糊口，必須要學一技之長，在三百六十行當中，樣樣都得從學徒做起，那裏一般家庭的男孩子到了十三、四歲，最多也就是讀書讀到小學畢業，爲了減少家裏吃飯的人口，幫助家裏生活，唯一的辦法就是外出當學徒。當然深造也並非易事，先要送禮托人介紹，人家買賣店鋪同意接收了，不但要找「鋪保」，並立下「字據」，所謂「字據」實際等於一張賣身契。深造的期限一般爲三年零一節，深造期間沒有工資，沒有休假。當深造的要早起晚睡，要伺候掌櫃的，要替老闆娘幹雜務和帶孩子，要端茶遞水倒尿盆，挨打受氣吃不飽都得忍著，如果深造期間因忍受不了，私自逃跑或上吊投河自盡，深造的家長要賠償店鋪的飯錢和損失。在三年時間裏是不是能真正學到手藝，那要看自己是不是勤奮和機靈。三年深造期滿，不要白乾部一節，算是對老闆和掌櫃的答謝。出師以後才能算是正式店員，可以掙一份工錢。掙了錢以後，除了要扣去吃喝，剩下的要拿回家去，幫助家裏養家糊口。

在那個時候居住在北京有情里的人們中，住深宅大院的畢竟是少數，多數屬於低收入的平民階層，一般都是一家一戶住在低矮的平房和小四合院，另外還有一些處於長期失業和半失業狀態的人們，生活當然就更爲艱苦，只能在大雜院裏租一間小房子居住。如老舍筆下拉洋車的駱駝祥子之流，終日爲生活而奔波，爲養家糊口而發愁。一些靠「打零工」和「作散工」爲生的人們就更爲艱難，一家老小瞪著眼睛盼著傍晚「當家的」回來，能帶回當天掙來的一點兒工錢。在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居民平均生活水準很低，人均最低生活費的標準是每人每月八塊五毛錢，當時政府公教人員的工資分爲「供給制」是由政府負責工作人員的吃、穿、住，另外還有點零花錢。「薪金制」是按當日的小米價格來折算，一般工作人員每月的工資相當於二百四十斤小米，如果小米當時市價是一毛錢一斤，當月的工資

折合二十四元錢。

打零工的瓦匠，大工（師傅）日工資大概是一塊五，小工每天最多也就掙一塊錢。傍晚回家把這一塊錢交給主婦，主婦第一件事兒就是拿著土簸箕到煤鋪去買一簸箕煤球兒，先把煤球爐子點著，爐子上還要單一個「拔火罐兒」，趁著火還沒著上來，煙還沒散完的工夫，趕緊抱著面盆到糧店去買五斤棒子麵（玉米粉）和一斤雜麵條兒。當時的玉米麵價格大概是每斤九分錢，而白麵（小麥粉）的價格是每斤一毛八分五，若不是逢年過節人們捨不得吃白麵。順便到油鹽菜店買一顆大白菜，回到家來蒸一大鍋窩窩頭，煮一大鍋雜麵條湯，有乾有稀，全家人能圍坐在一起熱熱乎乎地吃上一兩麵頓飽飯，這也就算是最大的滿足了。人們也沒有什麼多大的奢望，各家過各家的日子。男人一早就出去了，白天胡同裏大都是剩下婦女、老人和孩子，婦女們整天縫縫補補有忙不完的家務事，老人們湊在一起靠著牆根曬曬太陽閑聊天兒，孩子們在胡同裏嬉戲，胡同裏的生活倒也安靜祥和。

五十年代以前，胡同裏幾乎沒有什麼上下水設施，吃水要靠水車送，或自己到「井窩子」去挑，用完的髒水往大門口兒順手一倒。燒完的煤渣子、爐灰和修房子的渣土也往胡同裏倒，天長日久胡同的地勢越墊越高，下雨後雨水就從街上往院子裏流，人們就又墊院子，院子的地墊高了，水只能往屋裏灌。一下雨，家家都拿著簸箕和盆兒從屋子裏向外淘水。我從小就是胡同裏長大的，胡同裏的生活我再熟習不過了，我瞭解生活在胡同裏的人們的喜怒哀樂。

在北京的歷史上，北京的人口有幾次大變動和遷徙。西元一二七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立國號為「大元」定都於北京（大都），開始大興土木修築皇城，到一二七六年大都建成。忽必烈決定從原金中都的舊城選自部分居民到大都來居住，主要是富戶和官吏，貴族和功臣悉受封地，而且規定每戶占地的區域和面積都有限，一般為八畝，按照一定的規劃來建造，這樣就初步形成了城市街道和胡同的格局。據史料記載，到了元末大都的人口已有四、五十萬，可能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華的城市。

元朝經歷了不足百年，到一三六八年明朝大將徐達揮師北上，攻佔元

大都，元順帝出逃，元大都改稱為「北平府」。西元一四二一年明成祖朱棣正式遷都北平府，稱為京師，也就是北京。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改選和擴建的，明朝的北京比元大都更加宏偉和更加壯麗。隨著元順帝的出逃，蒙古人的勢力都被趕到大漠以北，因此明朝時期在北京居住的都是漢人了。

北京人口的又一次大遷徙是一六四四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在李自成的農民軍攻入北京時，吊死在景山的一棵歪脖子樹上，明朝滅亡。吳三桂勾結清軍入關佔領了北京，北京又成了清朝的京都。清軍進入北京後，強迫原來住在北京城內的漢人三天之內遷出北京，城內劃成八旗駐地。一時間，北京城就變成了八旗兵的兵營和滿洲貴族的府第。住在城裏的滿人也得生活，要吃、要喝、要買東西、要娛樂。滿清的官員們上朝下朝多從正陽門進出，漢人也就看准了商機，在正陽門以南，也就是現在的前門一帶做起了買賣，一時各種店鋪雲集，成了北京最重要的商業區。同時前門外還開了很多的飯館、茶館和戲園子，並且出現了有名的妓院林「八大胡同」。據傳就連同治皇帝也耐不住宮中的寂寞，跑到八大胡同逛窯子（妓院），結果染上了性病而一命嗚呼。

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出逃，鬼子兵在北京大肆燒、殺、搶、掠。一九零一年滿清政府與德、奧、比、西、英、美、法、意、日、荷、俄等十一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合約》，從此東交民巷一帶成了洋鬼子的使館區，中國人則不能進入。一九一二年，滿清政府垮臺，北京城裏留下了不少前清的遺老遺少，以及一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八旗子弟」。因為滿清垮臺了，自然也就沒有了「奉祿」，八旗子弟只好靠變賣祖宗的家產過日子，沒有幾年家產也敗得差不多了，他們也就逐漸變成了北京的平民百姓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北京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七七事變後，日本軍隊佔領了北京，隨之而來的有日本商人和一些專幹壞事兒的日本浪人，還有專替日本浪人幹壞事兒的韓國人，當時人們稱這些為虎作倀的韓國人為「高麗棒子」。直到一九四五年侵華日軍投降，這些日本浪人和高麗棒子才被遣送回國。

在日本人統治時期，北京幾乎成了人間地獄，北京人成了亡國奴，倍受屈辱。這段悲慘的歷史在老人中記憶猶新，在老舍先生的小說《四世同堂》裏有很生動的描述。

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隨之而來的蔣委員長和國民黨深深地讓北京的老百姓大失所望。首先進入北京的是國民黨的所謂接收大員。接收大員一到，主要有五件事兒，占房子、搶金子、撈票子、買車子、玩戲子，即所謂五子登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就是從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這短短的三、四年中，民不聊生，物價飛漲，民怨沸騰，國民黨很快就垮臺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古老的北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北京做為全國政治、文化和經濟的中心，城市的規模迅速擴大，人口也急劇地增加。因為老北京城內的地方有限，城市只能不斷地向外擴展。西郊是文化區，除了有名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之外，在海澱區又建立了石油、礦業、地質、鋼鐵、航空、郵電等的八大學院，我也是六十年代北京地質學院的畢業生。東郊是工業區，在酒仙橋一帶設立了規模龐大的有線電廠，無線電廠，電子管廠。朝陽門外設立紡織廠。廣渠門外是醫藥和化工企業。這些大規模的工業企業的建立，改變了老北京消費城市的經濟格局，促進了居民的就業。城區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拆除了北京的城牆，拓寬了北京的街道。五、六十年代也蓋了一些居民樓，基本上採用前蘇聯的設計圖紙，很簡單的統一模式。但蓋房子的速度遠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一九五三年以後，政府對北京的私有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大部分改成了「公私合營」，對老百姓的住房也進行了「私房改造」，原來北京的私有住房，都改由北京市政府房管部門統一管理，但產權還是私有，到文革時期也就統統的收歸公有了。為了緩解北京嚴峻的住房問題，原來小胡同裏獨門獨戶的四合院一下子就擠進去七、八家，變成了大雜院。要想生活，每家最起碼要有個煤球爐子，要有個生火做飯的地方，於是家家都要在院子裏圈一塊地，搭建一個能遮風避雨的小廚房。一個小院裏搭起了七、八個小廚房，可就

沒有了人能正常走道的地方。一旦發生了火警，也只有看著「火燒連營」，胡同太小，消防車都開不進去。就算是不著火，院子裏死了人擔架都沒辦法抬，只能靠人背著出去。小胡同裏人滿為患，也就失去了當年的風采和情趣。

一九六六年在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北京的人口又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遷徙和變動。首先是「紅衛兵」造反，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一時間抄家成風，把「地、富、反、壞、右所謂黑五類」，幾乎統統抄家遣送，轟出北京，名曰：「莎蕩滌一切水污泥濁水」。接著是北京一些機關和科研院所都在外地紛紛成立「五七幹校」，把一些學者教授列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集中到五七幹校去進行「鬥、批、改」，這就是所謂的走「五七道路」。當時提出「備戰、備荒」和「深挖洞、廣集糧」的口號，把一切重要的工廠、企業整建制地遷到大西南，名曰「支援三線」，一時很多工廠、企業連同職工家屬一起外遷。運動後期，由於學校長期停課，一些大專院校有的撤銷，有的也被遷往外地，如我的母校地質學院，最後跑到武漢落腳，石油學院遷往大慶，礦業學院我還真不知道遷到哪裡去了。最富戲劇性的要數那些極具造反精神的紅衛兵，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和「革命無罪，選擇有理」的口號之下，紅衛兵小將們把許多的街道和胡同的名字都給改了。過去所熟悉的街道和胡同名稱一時間就都變成了「紅衛路」、「紅日路」、「紅旗路」、「東風路」等等，當時的東方紅路就有三條。「興無胡同」、「滅資胡同」、「反修胡同」、「反帝胡同」、「學毛胡同」等等，既不知道在哪兒，也不知道有多少。這些充滿了文革色彩的街道和胡同名稱叫了一時，後來也隨著文革結束而消失了，但在歷史上也還是留下了印記。這也就像文革時期所破壞的文物古跡一樣，歷史的痕跡永遠難以消失。紅衛兵既有造反精神，也有驚人的破壞力，這一代紅衛兵們最後的歸宿就是所謂「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因此找不到時間就又成了「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插隊落戶」。北京知青的去向大都是

陝北、內蒙古、新疆、雲南、黑龍江等貧困的邊疆地區。這些知青的命運在文革以後的「傷痕文學」中有很多的描述，我這裏不想多述。

最近一次北京人口的大遷徙和大變動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文革期間北京幾乎是完全封閉，外地人赴北京要憑當地省市的進京證明。改革開放以後取消了進京的限制，到北京來打工謀生的人紛至沓來。北京也確實有很多賺錢的機會。北京大搞城市建設，建築工人來自全國各地。來北京做服裝生意的浙江人在豐台區成就了「浙江村」(大紅門的服裝批發市場)。安徽人則從事餐飲服務業，擺攤兒賣早點，進家當保姆。河南人來京揀破爛、收廢品。據說四川省某縣有一千多人佔據了北京的垃圾填埋場，把傾倒的垃圾進行分類回收，每年產值竟達人民幣兩千多萬元，這些錢匯回家去是當地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所統計在北京的一千三百萬人口中，流動人口就有三百多萬，這些外來人口為北京的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專門從事北京人不願意幹的活兒，但同時也給北京帶來了不少的治安問題，也因此北京人對外地人是既依賴、又厭惡、又嫌棄。

近十年以來，北京的變化日新月異，城市的規模也越來越大，以前的老北京的範圍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只限於城圈以內，也就是現在的二環路以內的範圍，從前門外到永定門一帶已經算是外城。直到文革期間也沒有拓展到現在的三環路。而現在北京的城區已拓展到四環、五環甚至接近於六環，就快和原來的郊區縣連成一片。隨著城市的規劃和對舊城的改造，成片低矮的小平房改建成比較現代化的居民社區。有更多的人告別了居住多年的四合院(大雜院兒)搬進了新居，人們的居住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搬進樓裏的人們卻覺得似乎少了點兒什麼，家家戶戶的窗戶上加了護欄，大門是防盜鐵門緊鎖，人們進了家門就好像被關進了籠子裏。推開窗戶往外一瞧，馬路上車水馬龍，日夜喧囂。除了小轎車、大客車以外，救護車、警車、消防車不時拉著警笛呼嘯而過。尤其是到了夜裏，大噸位的砂石車、大貨車進城了，從街上一跑，房子都跟著動搖，好像地震發生了，半夜裏剛睡著又被嚇醒了。據說現在北京的機動車有一百三十

多萬輛，北京的居民中有兩百多萬人手裏有駕駛執照，開車的人中不乏一些剛領執照的「二把刀」。所以說上街過馬路還真得留點兒神，千萬別碰上「二把刀」。車輛太多造成交通堵塞，這已經是現代化城市的通病，不但噪音太大，而且造成空氣的污染，破壞環境。

現在的北京城，現代化的氣息也越來越濃，城市的人們生活節奏也越來越快。當然，這些對於年青人來說沒有什麼問題，而對於老年人來說越來越難適應。有很多看似簡單易行的事情，老年人卻覺得很不容易辦到。我總結出老年人的三個不會，這第一個不會就是老年人眼神差、腿腳慢，看見呼嘯而來的汽車就眼暈，有的地方找不著人行橫道，也就不會過馬路了。第二個不會是不會取錢，現在發退休金用不著到單位去取，直接就打進了信用卡裏。老頭自己到櫃員機上去取，一大長串的號碼若有一個輸入的不對，錢就取不出來，如果連續兩三次輸的不對，機器就連卡都吞直支了。第三個不會的是不會買東西，如今大商場、大超市實在是不少，走進去一看令人眼花繚亂。就拿穿的來說，能適合老年人穿的很少，有時幾乎找不著。如果你去逛早市，看見黃花魚挺鮮亮的，買回家用水一沖，黃花魚就變成白花魚了，原來是用顏色染的。買了一塊肉，弄不好還是注水的。想起老北京，哪怕是做小買賣的都講究職業道德，大門臉兒的老字型更是「童叟無欺」。

人貴有自知之明，人老了、退休了就應該退到適合你的地方去。如今我選擇了遠離北京百十公里之外的遠郊區，密雲縣溪翁莊鎮，這裏有山有水，遠離城市喧囂和煩惱，可以過一種與世無爭的鄉下人的日子。事情就是這樣，現在的北京，有的人拼命的往城裏擠，有的人又由北京城裏往城外遠郊區跑。

北京的小胡同經歷了幾百年，見證了北京的歷史。小胡同裏有講述不完的故事，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看來低矮的小平房和變了樣的四合院連同小胡同都抵擋不了漸漸消失的命運。

二〇〇一年八月卅一日 于溪翁莊